

新时期

时期小说论

——评论家十日谈

阎纲 朱寨 顾骥

著

尉西来 王愚

2

陕西人民出版社

354

新时期小说论

——评论家十日谈

阎纲 朱寨 顾骥 著
何西来 王愚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建总公司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5插页 250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统一书号：10094·709 定价：2.50元



评论家在一起（左起：王愚、阎纲、朱寨、顾骧、何西来）

新华社张桂玉摄



座谈会上

新华社张桂玉摄

导 言

阎 纲：

今天有幸请诸位在一起交谈，我很感谢，也很高兴。不为别的，只为这本书采取随谈录的方式。编这本书的主意是陕西人民出版社郭继明同志出的。今年五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西安开会，郭继明同志正式同我洽谈此事，决定搞出一本关于评论新时期小说的书。新时期的小说成果现在迫切需要评论，多予总结。但是评论还不普及，原因之一是评论形式本身不够活泼。我们的经济要搞活，企业管理要搞活，文学艺术创作要搞活，文学评论也要搞活。出于这一设想，我们编这本随谈录式的文学评论集。这个主意得到陕西人民出版社编委会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支持，当即拍板，立刻行动，旋即组成这个小小的集体。

我们准备谈谈关于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十个问题，如：对建国以来小说创作的回顾；新时期小说的产生；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情况、特征和基本经验；小说创作向何处去等等。这些问题俱新鲜而重要。如果能得到一些新的回答，我想对于新时期小说创作不无积极的作用。

因为采用随谈的形式，打算花十天时间，一日一题，因此我把这本书取名为《评论家十日谈》。

几个朋友凑在一起，颇得“以文会友”的雅兴。顾骥同志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何西来同志也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研

究工作，他们对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特别关心，著文不少。王愚同志从事小说批评和评论编辑工作，是陕西省活跃的文学评论家。我也是个文艺编辑，业余从事文艺评论工作，是新时期小说的专业读者，我们还高兴地请到德高望重的朱寨同志，为这次交谈增色不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白桦同志和郭继明同志参加本书的编辑工作，看来诸事俱备，相信谈得起来。

文学评论应该是旗帜鲜明的，应该有真意，去雕饰，大胆立言，放言高论，张扬新说。所谓随谈的方式，就是交谈、恳谈的方式，也是自由谈的方式。以上就是本书的成因。自由谈就从今天开始，时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一个问题：建国以来小说创作的回顾。

• 目 录 •

一、必要的历史回顾.....	(1)
二、题材的开拓.....	(49)
三、“改革小说”	(79)
四、人物·性格·典型.....	(112)
五、人性·人情·人道主义.....	(146)
六、创作个性和风格.....	(173)
七、小说观念和创作方法.....	(210)
八、评论的评论.....	(246)
九、经验和教训.....	(299)
十、文学的改革与小说的发展.....	(333)

一、必要的历史回顾

回顾：

研究新时期小说创作，必须把它放到建国三十多年来的文学发展历史长卷中来考察，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宏观的研究。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必然是宏观的。恩格斯一再强调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世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既然是相互联系的，那么，研究文学现象，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孤立的截取一段，作静止的考察。

纵的联系就是历史，横的联系就是文学与政治、哲学等其它意识形态的关系；贯穿其中的是文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比如，研究欧洲文学史，我们会看到浪漫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的形 成，与十九世纪古典哲学思潮对它们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所以研究新时期的小说，要有这样的宏观的眼光。

新时期小说放在三十五年的小说发展史中来看，就会承认它是小说创作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成就最辉煌的一个时期，也是大有希望的一个时期。我们可以预想将会出现大作家、大作品，这不仅是个美好的主观愿望，而是具有客观可能性。经过三十多年曲折的道路，发展到今天，文学包括小说是成熟了，虽然这成熟是比较而言的。一个人，一个政党的成长，总是要经受正反两面的教育，才能深刻地掌握规律性的东西，文学亦然。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成熟，就是因为既有了大革命初期和抗日战争初期大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有党内几次错误

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失败的教训。有了经验，又有了教训，把它们总结起来，就会走向成熟。成熟的标志就在于把握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与特点，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掌握了规律，我们也就比较自由了，就能因势利导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三年多的时间就夺取了全国政权，取得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文学也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十年动乱，教训是如此深刻，矛盾暴露得如此充分。矛盾的发展有一个过程，这样，就连带使我们对“十七年”的是非看得更真切了。这样就引起我们认真的思考。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在思考，整个民族在思考，文学也在思考。正反两方面比较，对文学创作规律性的认识，无疑有了飞跃的进展。比如说吧，“四人帮”把文学弄成“无情文学”，从反面使我们体察到人情在文学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重要。从我们切身感受中形成了一个概括：情感是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样，我们就向文学创作的规律性认识，前进了一大步。我们的文学成熟得多了。这是小说创作大繁荣、文学大有希望的主观条件。这是一。

其次，我们新时期小说是处在我们国家历史大转折的时期。转折时期的历史，丰富的社会矛盾，给文学的大繁荣和产生大文学家提供了条件。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战国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光辉的时代，章学诚说“后进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就在这个时期，产生了我国第一位大诗人屈原和他的《离骚》；乾隆年代，是清王朝繁荣的顶点，是封建社会变革的前夜，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这时产生了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把中国古典小说推向了高峰。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转折时

期，产生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一代文豪鲁迅。这是中国的情况。再看西方，欧洲氏族公社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产生了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优秀作品：希腊神话、荷马史诗。恩格斯说：荷马史诗以及全部希腊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

何西来：

荷马史诗应该算是希腊社会进入奴隶制度时期的作品。它们所反映的时代，被称为“英雄时代”，这时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完全存在的。“荷马问题”曾经是文学史上长期争论的题目。据说，荷马生活的时代大约在纪元前九到八世纪，《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直到纪元前六世纪，才最后定形，这已经接近希腊奴隶制的鼎盛时期了。

顾 骥：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按照摩尔根的分期法，所称的野蛮时代，就是奴隶制社会。在欧洲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新的资产阶级诞生的转折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是继希腊文学以后，欧洲文学又一次高峰。诞生了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这样的文学巨匠。

何西来：

在历史的转变时期，常见文学的繁荣和伟大作家作品的出现。恩格斯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顾 骥：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但丁列为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现在我国也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由多年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搞“四化”，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虽然，这不是社会性质的变更，但这是对社会矛盾掌握上的重大调整。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变化。它为文学的大繁荣，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这是二。

还要补充一点。史诗性的作品、尤其是宏篇巨制的长篇小说需要有一段思想上与艺术上酝酿的时间。从现代文学来看，十年往往是一个周期。“五四”以后，在第一个十年里，长篇仅有叶绍钧的《倪焕之》等，为数很少。而作为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峰的几部长篇名作，都是产生在第二个十年里。

《子夜》完稿于1932年，《家》出版于1933年，《骆驼祥子》发表于1936年。

建国以后，第一个十年虽然产生了《保卫延安》等几部长篇，而著名的、代表建国后文学水平的三“红”一“创”以及《青春之歌》等，差不多都是在第一个十年末，第二个十年初问世的。现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也很快就要满十年了。经过这一段时间，思想和艺术上的积累，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的大丰收在望了。因此，我们有根据地说，文学的新时期，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时期。

何西来：

在新时期文学中，最早描写“文化大革命”的是“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主要是反映“文化大革命”中人的灾难，人的受苦以及这个特殊环境中英雄人物的奋斗与抗争等等。伤痕文学是新时期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创作潮流的潮头。它的意义

和价值，一直到现在，我们才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可见，对一个历史事件，特别是对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历史事件，人们的认识是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的。事物的面面观，也就是从各个不同角度去认识，最后才能得出比较正确、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所以，“文化大革命”不是写多了，而是写得不够深。从艺术上看，只要写得好，即使稍多点，我看也不为过。那种认为文化大革命写多了，需要采取筑坝的方式来加以阻挡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阎 纲：

顾骧同志刚才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在回顾中展望了新时期小说的前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然后请何西来、朱寨同志把问题引向深入。

五四时期，先是文学革命，再是革命文学，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进入抗战文学时期，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应该说，全国解放之后的文学按理应该是社会主义文学（以前是新民主主义文学），而社会主义文学，正如列宁所说，应该是真正的文学，是自由的文学，这是历史的要求，也是文学史的要求。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因而形成历史的大矛盾，文学史的大矛盾。你说这是历史的不幸也行，是文学史的悲剧也行。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文学，真正的文学，自由的文学，也就是说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小说，真正的小说，自由的小说，而实际上却不是。应该在这个时期出现大作品、大作家，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也是文学史上的大悲剧，小说史的大不幸。我们回顾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的二十七年，目的就是要深刻认识这种矛盾、这种不幸，然后指出小说发展的广阔道路。一九四九年以后不

仅没有踏上一条大路，完成这一恢宏的历史任务，反而在文革十年来了个大倒退，一直退到需要进行“五四”文学补课的地步。多大的悲剧！难道不是补课吗？当时是打倒孔家店，现在提出文学解放、小说解放，又重新面临一个思想解放的运动。周扬同志讲过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是两大解放，这是一次，“五四”时一次，而现在这次思想解放的任务则是五四运动时期思想解放的继续，是补课，这也是历史的不幸。

何西来：

“五四”运动的特点是反帝、反封建，打倒孔家店，现在也还有反封建的任务，特别在意识形态领域中。

阎 纲：

所以，此刻我不能不怀着沉痛的心情回顾小说创作二十七年的发展历史。倒退了，倒退到了“五四”运动已经宣战、现在重新宣战的地步，然而，我们却比“五四”运动晚了半个多世纪！从一九四九年开国到“文革”时期，文学应该进入社会主义文学的时期，这个时期中间却经历了“文革”，不光彩的文革，黑暗的十年文革！“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加起来正是二十七年，为了谈起来方便，根据不同的特点，不妨把二十七年分成几个小段。第一阶段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到一九五七年反右，这七个年头是比较特殊的时期，有些文学史家称之为开拓期，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小说的发端期、发萌期，也是幼稚期。不管怎么说，它在成长。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这十年又是一个时期，这时期的情况比较复杂，可以叫做曲折期，也可以叫回环期。接着又是一个十年，也就是“文革”十年，这是黑暗的十年，不但是中国历史上黑暗的十年，也是中国文学史、小说史上黑暗的十年。这个时期是荒漠期，沙漠一

样的荒凉。二十七年后新时期的文学也可以分成几个小段。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年，是政治上的徘徊期，小说创作的苏醒期。同政治不大一样，政治在徘徊，文学却在迈步，出现了《班主任》、《哥德巴赫猜想》等开始否定文革的作品之后，文学好象走到政治前面去了。接着便是六年，三中全会到现在。这六年是兴盛期，兴盛期不一定达到高度繁荣，但是正在走上坡路。从萌发期到回环期，到荒漠期，到苏醒期，再到兴盛期，这一简单的系列，可以看出我们走过的道路多么曲折、多么痛心！

二十七年的小说创作仍然取得成绩，当然付出的代价太高。在整个文艺创作中，文学创作是代表；在整个文学创作中，小说创作是代表。要了解一个时期的文艺创作的成就，看一看文学创作的情况，大体可以知道它的面貌；要了解文学创作的成就，看看小说创作情况就可大体知道它的面貌；而看小说，只要抓住它的代表作，也可以大体知道它的面貌。二十七年中我们取得的成就不可忘记，尤其不能忘记这样一些好作品，象“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还有《三里湾》、《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保卫延安》、《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在和平的日子里》……。

顾 骥：

我插一句，考察“十七年”小说创作，常常对孙犁的“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作品，以及类似的作品估价不足。现有的一些文学史著作，都有这问题。

阎 纲：

对，我有同感。可以从代表作看问题，也可以从代表作家

来看问题。代表作家不能忘记的还有：周立波、欧阳山、王汶石、马烽、李准、茹志鹃等等。通过这些作品和作家，大致可以看出二十七年来小说创作的成就。成就在哪里？就在这些代表作中间，在这些代表作家中间，在以这些作家和作品所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和作品中间。这些作家、作品的出现，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小说创作在加强小说创作与群众的联系方面，在坚持小说创作的社会主义方向方面，成就是出色的，旗帜是鲜明的。尽管它们本身还存在着缺点——这是下面将要谈及的，但它们的确同群众相结合了，的确大声疾呼地歌唱共产党，歌颂新社会，歌颂劳动人民，歌颂革命。这一点非常突出。我们以前的小说从来没有象二十七年时这样深入群众。“五四”以后的小说创作也深入群众，但读者层不大一样，更多是在城市里流传，更多是在学生、干部中流传。象开国以后那样广泛地在工农兵中流传，恐怕为新文学史上所未有。不能不看到这是一个很突出的成绩。其次，这些作品得以出现，是我们党一直坚持作家要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结果。这些作家、作品的出现，说明深入生活是正确的，而且今后要出好作家、好作品，这一点还要坚持。以上回顾的作家、作品，没有一个不是在生活中打过滚的。这些作品是作家写出来的，同时也是生活自己跳到作家作品中去的。这样说也许失礼，但说明了生活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从中我也发现了问题：写得较好的作品，相当一部分有以下的特点，一是大多写战争、写农民，二是写战争也好，写农民也好，大多写开国以前。真正写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生活、新工人、新农民的，包括一些新运动的作品，成活率一般不高。这一现象值得深思。因此，写新生活写得好

的小说，应该倍加珍视。

顾 骥：

值得重视的是《创业史》。

阎 纲：

是的，《创业史》在座同志都曾给它以高度的评价，到目前为止我还认为这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创业史》这样的作品能举出几部来？《铁木前传》则从另一个角度，以另一种风格写农民，是一部精妙的作品。

何西来：

《在和平的日子里》今天看起来也还有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也还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比如梁建这个形象，就是一个重要发现，写得相当有深度。

阎 纲：

还有那位阎兴，还有那位工程师，都刻画得深刻。这部作品对知识分子是肯定的，看得远。这部作品今天想起来也还是那么惊心动魄，但是，象这样的作品能举出几部呢？当然，写战争的还可以举出几部：《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烈火金钢》……。

顾 骥：

说到《烈火金钢》，我感到，我们过去对通俗文学重视不够，有点偏见，似乎未把它列入文学之林。比如《烈火金钢》它以传统评书的形式，写抗日战争惊心动魄的故事，当年在电台广播，很受群众欢迎。其听众，即读者恐怕不下于上举的任何一部优秀小说。而我们有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对它只是点到为止。

阎 纲：

它和《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一样备受群众欢迎。鲁迅曾经讲过，在大众文学中间，在说唱文学中间是会出托尔斯泰的。在今天的通俗文学中，何尝不能出大作家！

何西来：

托尔斯泰晚年也确实写了大量通俗性的作品，他称这些作品为“民间故事”（На родные Рассказы），如《高加索的囚徒》、《人靠什么活着》、《一个人需要许多土地吗》、《傻子伊万和他两个哥哥的童话》等。这些作品借鉴了俄罗斯民间文学中传说、童话、寓言等的表达方式，通俗易懂，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别具一格。

阎 纲：

总之，这些情况值得注意，有好的一面，同时带来缺憾。社会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就应该是对社会主义新的世界、新的人物有所表现。充当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艺术镜子。当然，镜子不能狭隘理解。有人以为镜子只是机械的反映，其实这是打比方，作为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社会面貌的本质的镜子，即史诗性的小说，并没有出现。这是很大的缺憾。社会主义时期的小说服务于群众，面向群众，深入群众，是“五四”以来小说所不具备的。深入生活，而且为作家长期深入生活提供方便，这也是“五四”以来无法比拟的。其次是坚持革命现实主义，是成绩也是宝贵经验。粉碎“四人帮”以后，提出恢复革命现实主义是非常必要的。二十七年来小说的成就不能抹杀。为什么成就较大的作品都是那些写解放前生活的小说呢？两个原因：一是这些作家是从那种生活中过来的，自己写自己，材料用不完。

朱 寨：

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发言说：“现在我发现确实有不少